

国外可理解性研究述评¹

张伶俐

北京外国语大学 /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 2014 中国外语教育(3), 47-53 页

提 要: 可理解性不仅是世界英语和英语通用语领域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英语语音教学可达到的目标,然而国内研究却尚未涉及。本文系统回顾和梳理了60年来国外可理解性的研究成果,包括可理解性的内涵、可理解性的影响因素及可理解性的实证研究。研究比较了世界英语理论框架下Smith范式和英语通用语框架下Jenkins范式的可理解性研究的差异,分析了它们在研究设计和测量方式上的局限和未来研究趋向,进而探讨了可理解性对我国英语语音教学的启示。

关键词: 口音;可理解性;世界英语;英语通用语

1.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英语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通用语言。它不再是本族语者的专利,而是属于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或需要而使用它的人(Hasman 2000)。Crystal (2008) 估测,全世界有20亿人将英语作为二语或通用语使用,大大超过了母语使用者,其比例至少是4:1。一方面,可理解性是英语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关键点,如果达不到可理解性的底线,英语就会失去通用语的地位(文秋芳、俞希 2003);另一方面,在英语通用语的交际中,双语使用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保留英语口音来表明身份,以确认自己没有背叛母语社团(Morley 1991)。鉴于可理解性对英语通用语交际的重要性,学者们对其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近60年的可理解性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1950—1978年为起步阶段:该阶段以母语者口音为对比框架来研究外圈国家²英语使用者口音

的可理解性,他们希望通过使用本土化英语变体来摆脱语言帝国主义。Bansal (1969) 的《印度英语口音的可理解性》及Tiffen (1974) 的《尼日利亚英语口音的可理解性》两篇博士论文为主要成果。1979—1999年为发展阶段:Smith和Rafiqzad (1979) 对9种英语口音的可理解性对比研究标志着第二阶段的开端。该研究推翻了本族语者发音比非本族语者可理解性高的假设,构建了Smith范式,对世界英语的可理解性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该阶段研究,非母语者努力被母语者理解的单向过程的观点比较盛行。21世纪以来,Jenkins (2000) 的《英语国际语的音系学》的出版,标志着可理解性研究进入繁荣阶段。她跳出了传统的Smith范式,对非本族语者之间交际的真实语料进行了实证研究,构建了Jenkins范式。英语通用语的可理解性开始得到重视,可理解性研究成为热点话题。该阶段研究在Smith和Jenkins两种范式下进行。2008年*World Englishes* 杂志第三期设有世界英语的可理解性与跨文化交

1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大学生英语发音的国际可理解性研究”(11YJC740142)及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央高校专项资金特色团队项目“中西语言文化对比与传播-续”(CUG130105)的部分成果。本文得到文秋芳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谢忱!

2 Kachru (1985) 提出了同心圆模型,将世界英语分为内圈(英语为母语的)、外圈(英语为二语的)和扩展圈(英语为外语的)。

际专栏。Nelson (2011) 的专著《世界英语的可理解性：理论与应用》以世界英语为理论框架，对可理解性概念进行了明晰的阐释，对著名学者的可理解性研究进行了系统介绍。

然而，中国英语口语的可理解性研究刚刚起步，仅有 Kirkpatrick *et al.* (2008)、Deterding & Kirkpatrick (2006) 和 Deterding (2010) 进行了相关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可理解性的内涵、可理解性的影响因素以及可理解性的实证研究等三方面进行述评，分析可理解性研究的局限和未来发展趋势，以寻求对我国英语语音教学的启示。

2. 可理解性研究成果

2.1 可理解性的内涵

可理解性的概念最早由 Catford (1950) 于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将其区别于“言语的有效性”，定义为“对说话目的的恰当反应”。Catford 进一步提出了“可理解性阈值” (intelligibility threshold) 概念以描述“使用者与另一门语言或语言变体接触量的多少所导致的对它的熟悉程度”。Smith 和 Nelson (1985) 将可理解性定义为“对说话者说话意图的信息的理解”，将其分为三个层面：可理解性 (intelligibility)、能理解性 (comprehensibility) 和可领会性 (interpretability)。可理解性是指听话者认知单词或言语的能力；能理解性是指听话者在特定语境下理解单词或言语的能力，即言内效力；可领会性是指听话者理解单词或言语背后说话者的意图，即言外效力。Smith (1992) 认为，这三个层面是复杂的连续系统，且难度系数逐渐增大。因所涉及的变量数不同，可理解性最容易，而可领会性最难。Bamgbose (1998) 也赞成这种观点，将可理解性描述为“一些因素的集合体：包括识别一个词语、了解它的意义、知道它在社会文化语境下所指的意义等三层含义”。Jenkins (2000) 认为可理解性是对单词和话语形式特征的产出和认知，尤其是产出和接收语音信号的能力，是言内和言外中介话语交际成功的前提。她建议将可理解性的概念标准化，定义为单词或

言语的认知。Nelson (2011) 提出总体可理解性 (intelligibility-in-general) 的概念以区别于可理解性 (intelligibility)。他认为，虽然难以清晰地界定可理解性的标准、参数及构成部分，但可理解性是“语言使用有效性的重要标准”。

鉴于可理解性的复杂本质以及不同的研究视角，学术界对总体可理解性的内涵基本达成一致，但在可理解性三个层面的权重上则持不同观点。文献中多用 Smith 定义，虽得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可理解性三个层面具有很高的相互依赖性，虽在理论层面区别明显，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很难完全分开。其次，可理解性的概念看似中立，因涉及“对谁可理解”的问题，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软肋。该定义没能表述出可理解的语言以及成功交际的错综复杂性 (Rajagopalan 2010)。本文借鉴 Smith 定义，以及 Nelson 对总体可理解性和可理解性的区分。

2.2 可理解性的影响因素

可理解性在本质上是听话者和说话者双方互动的过程 (Smith & Nelson 2009)。它既在说话者的口中，也在听话者的大脑中 (Morley 1991)。影响可理解性的因素较多，本文重点从说话者和听话者两方面进行梳理。

说话者的英语口语特点是最为突出的因素，但关于音段还是超音段语音特征更影响可理解性未达成一致。部分学者认为，二语英语口语的可理解性更多与超音段相关 (Anderson-Hsieh & Koehler 1988; Munro & Derwing 1995)；Jenkins (2000) 则认为导致可理解性失误的最主要因素在音段层面。因为英语通用语说话者更多地采用自下而上的信息处理方式，即更多地依赖语音形式，而不是其共同的背景或语境知识进行推断。此外，说话者因素还包括性别、二语的学习年龄和使用经历、语言学习能力和学习动机等 (Flege 1998; Piske, Mackay & Flege 2001)。

听话者的态度是影响可理解性的重要因素。听话者如果期待去理解说话者，将会发现说话者的可理解性更高；相反，如果听话者对某些

口音有着消极的反应,就会认为其不可理解。Rajadurai (2007)指出,对二语说话者否定的态度可能导致母语者不愿分担交际负担,而宣称即便是表达清楚、高水平的二语说话者不可理解。此外,听话者对英语口语(世界英语口语和特定英语口语)、相关话题和文化及说话者的熟悉程度及其二语口语水平也影响着可理解性(Field 2005; Rubin 1994)。

2.3 可理解性实证研究成果

在Smith和Jenkins两种范式构建之前的可理解性研究属于起步阶段,该阶段研究通常以母语者口音为对比框架进行。Bansal (1969)研究了美国、英国、印度、尼日利亚和德国等五国听话者对印度英语口语的可理解性,发现可理解性水平最高为93%。他认为印度英语口语完全可能被听懂,将其总结为“不规范”,或认为“整个印度民族的中介语出现僵化”的观点非常具有毁灭性。Tiffen (1974)研究了尼日利亚英语口语对于英国听话者的可理解性,发现可理解性最高分为92.7%,导致可理解性失败的主要错误有重音、音段和句法等。

2.3.1 Smith范式下的可理解性研究

Smith和Rafiqzad (1979)以世界英语为理论框架,构建了Smith范式。其对可理解性的操作定义包含可理解性、能理解性和可领会性三个层面。听话者和说话者来自内圈、外圈和扩展圈。可理解性的测量通常采用确切词(exact-word method)¹、听力理解、完型填空、对刺激图片的反应及判断正误等方法。能理解性的测量采用莱克量表(1—9),由听话者对说话者的理解难度进行评分。可领会性的测量则采用解释对话和回答问题等方法。Smith和Rafiqzad (1979)选取了9名英语教师(来自9个国家或地区)的演讲录音,由1386名听话者(来自亚洲11个国家)进行听写和评估。研究发现,听话者对可理解性评估的一致性非常高。美国口音和中国香港口音排在倒数三位,而日本口音排在前五。他们提出,可理

解性的评价应该由母语者和非母语者共同判断,而母语者口音也应该被非母语者裁判。在Smith范式下,学者们对可理解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然而,鉴于可理解性的复杂本质,已有文献中总体可理解性的研究相对较少;在三个层次的研究中,可理解性和能理解性研究相对较多,仅针对可领会性的研究则未见于文献。

1) 总体可理解性研究

Smith和Nelson (2009)测量了9种英语口语的总体可理解性。听话者共三组,每组10人,非母语者(日本)、母语者(美国)和混合组(美国、中国、印度、韩国、菲律宾等)。研究发现,语言水平影响着可理解性的三个层面。母语者口音的可理解性、能理解性不一定最高。Rooy (2009)研究了韩国英语口语对南非听话者的总体可理解性,发现单词认知的可理解性较低,有语境的语言认知的能理解性和可领会性较高。当文化负载增加时,在国际语境下的总体可理解性会降低。

2) 可理解性各层面研究

可理解性层面的研究侧重于对英语口语中影响可理解性的语音特点及其对语音教学的启示作用的研究。Suenobu *et al.* (1992)研究了日本英语口语对美国听话者的可理解性,发现日本学生的发音错误有增音和替代、辅音省略、重音及停顿等。其中,辅音省略最难理解,增发元音反而提高可理解性。Tsuzuki和Nakamura (2009)选取了21名日本大学生在模拟国际会议上的口头报告录音,由11名本族语者(美国、英国、加拿大)进行逐字转写和评分。研究发现,导致交际失败的语言错误有爆破音和流音、元音音长和单词重音等。Kirkpatrick *et al.* (2008)以6名中国香港地区的大学生与一位英国侨民教师的谈话录音为语料,以37名新加坡和35名澳大利亚大学生为听话者,得出中国香港地区的英语口语的国际可理解性及可接受度很高的结论,并建议将其作为语音课堂教学模式。Tan和Castelli (2013)从语料库中选取15个句子作为语料,由20个国家的200余

¹ 即听话者听完录音后进行逐字转写,正确转写的单词百分比被认为是说话者话语可理解性的指标。

名听话者进行评估。研究发现,不同国家听话者对新加坡英语口语和美国英语口语的可理解性存在差异;可理解性与态度并非简单的正负相关。

能理解性研究多与可理解性相结合。研究表明,英语口语对于积极接触它的人们能理解性最高;可理解性和能理解性不能简单地归结于该变体的语言特征。Smith & Bisazza (1982) 以7个国家201位大学生为听话者,研究了美国、印度和日本英语口语的能理解性,发现其能理解性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美国英语最高,其次是印度英语和日本英语。Matsuura *et al.* (1999) 研究了日本大学生对美国口音和爱尔兰口音的可理解性和能理解性,发现说话者的声音特点,如清晰度、语调、流利性和停顿等影响了可理解性。Van de Walt (2000) 以电台录音和电视录像为语料,以16种不同母语背景的140人为听话者,证明了南非英语口语具有国际能理解性。Smith 范式下的研究充分证明了二语英语口语具有国际可理解性和能理解性,母语者口音比起非母语者口音没有更高的可理解性。因此,熟悉不同英语口语和提高话语的流利性比起习得母语者口音更重要。

2.3.2 Jenkins 范式下的可理解性研究

Jenkins (2000) 以英语通用语为理论框架,构建了Jenkins 范式。其对可理解性的操作定义仅限可理解性层面,不含能理解性和可领会性。该范式下的研究通常对非母语者之间真实交际的录音语料进行转写分析,说话者仅限外圈和扩展圈,不含内圈国家。Jenkins (2000) 搜集了大量的不同母语背景的人们之间交流的语料(如日本人、瑞士人和德国人等),重点分析了导致可理解性失败的语音特点,提出了通用语核心理论(Lingua Franca Core),即影响可理解性的核心特点是大多数辅音、辅音群简化、元音音长及句子重音。Jenkins (2002) 建议在语音教学中以这些“可教、可学”的共核音为重点,满足非母语者之间用英语交流的需要。而核心之外的二语变化被认为是地方口音,不是语音错误。在Jenkins 范式下,学者们对东南亚英语和中国英语口语的可理解性进行了研究。

Deterding & Kirkpatrick (2006) 调查了东南

亚英语通用语的发音特征及其可理解性。录音材料为东盟10国的20位教师在东南亚区域语言中心一门课程中的小组讨论。研究发现,其共同的英语发音特点有:/t/替代/θ/、词首送气的简化、单元音替代双元音/eɪ/或/əu/、元音不弱读、代词重读、句末单词重读。它们不仅没有导致交际中断,反而增强了可理解性。Kirkpatrick (2010) 在其专著《东盟英语通用语:一种多语模式》中使用了大量的数据,进一步阐释了东盟英语通用语的语音特征。Deterding & Kirkpatrick (2006) 和Deterding (2010) 以通用语核心为对比框架,研究了影响中国学生英语可理解性的发音特点,并建议将其作为语音教学的重点。如用/ʃ/代替/ʒ/、词尾/n/音省略、/n/和/l/混淆、元音音长和音质及句末单词重读等。而一些发音特点如th音、词尾辅音连缀、元音简化、节奏和语调等不影响可理解性,因此并不重要。Deterding (2012) 使用亚洲英语语料库中的文莱达鲁萨兰大学的语料,重点分析了导致误解的数据,得出误解多由辅音的替代造成等初步结论,强调对英语通用语交际语境分析的重要性等。总之,Jenkins 范式下的研究对英语通用语语音的教学重点、教学大纲设置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让我们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学习者目标和教学效果。

总体上讲,Smith 范式采用大样本调查方法,让世界各地的受教育人群对英语口语进行转写和评判。语料为说话者录音,以朗读和独白居多,属于对可理解性结果的静态研究。而Jenkins 范式关注非母语者之间在英语通用语语境中的交际,语料为说话者之间的对话录音,属于对可理解性过程的动态研究。Smith 范式既关注影响可理解性的语言因素,也关注非语言因素;而Jenkins 范式则主要关注影响可理解性的语言因素。

3. 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趋向

世界英语与英语通用语学者们在可理解性对于成功交际的重要作用方面达成了一致,但因使用了不同的操作定义,而采用了不同的研究设计和测量方法。已有可理解性研究存在以下局限。

3.1 研究设计存在局限

Smith 范式多使用受教育者的录音样本, 较少使用自然语料。其录音样本的代表性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即如何证明所选取的说话者就是该英语口语的合法代表。此外, 录音样本在长度、复杂性、语速、真实程度、即时性及语境等多方面存在差异, 因而研究成果在推广上存在局限性。Jenkins 范式虽使用了不同母语背景的说话者交际的真实语料, 聚焦导致交际失败的数据, 得出影响可理解性的语音特征, 但研究对象在数量和代表性上缺乏一定的科学性, 研究成果尚需进一步验证。语料库的蓬勃发展为可理解性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科学可靠的数据依据, 目前已建成的著名英语通用语料库有维也纳—牛津国际英语语料库 (VOICE)、学术环境中的英语通用语料库 (ELFA) 和亚洲通用语英语语料库 (ACE) 等, 未来可理解性研究可与语料库语言学相结合。

3.2 测量方法尚需完善

Smith 范式采用量化研究方法测量了可理解性各层面的水平。然而实际测量中, 可理解性很难与能理解性分开; 能理解性评分更多地反映听话者的主观态度和偏见; 可领会性的测量方法尚不多见。此外, Smith 范式没有充分考虑到语境的动态性、言语的互动本质等问题。而 Jenkins 范式虽是对可理解性的动态研究, 而研究者本人仅围绕着可理解性层面进行的质化分析方法也尚待完善。总之, 目前尚未设计出对总体可理解性的科学的测量方法, 因而不可能对某个特定说话者英语口语的可理解性作出全面的描述 (Munro *et al.* 2006)。可理解性是动态的、协商的过程, 而不是完全固定的产物。未来的可理解性研究应该更多地置于社会文化和交际的语境中, 设计出科学合理的总体可理解性测量方法。

4. 可理解性研究对我国英语语音教学的启示

目前, 我国英语语音教学整体上还是遵循

RP 或 GA¹ 母语者英语规范, 国内在可理解性教学与研究方面较为薄弱。为了增强学生口语表达的有效性, 英语语音教学必须走出传统的接近母语者的完美发音原则, 转向可理解性原则 (Abercrombie 1965; Morley 1991; Levis 2005)。首先, 母语者口音不一定比非母语者口音的可理解性更高, 严格遵守母语者英语规范并非解决可理解性问题的万能药。其次, 它忽视了英语通用语的现实, 我们更多与带有地方口音的非母语者进行交流。最后, 它还忽视了学生的多元英语学习需求和学习目标。Walker (2010) 在其专著《英语通用语的语音教学》中指出, 只有采用英语国际语的教学方法才能使可理解性和身份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达到和谐。

英语教师应持有多元标准观, 让学生接触各种世界英语口语, 培养其全球英语意识, 提高其对口音的容忍度, 增强其对中国英语口语的自信心。其次, 外国口音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等同于不可理解。实证研究结果一致表明, 并非所有的口音特点都影响可理解性。教师应充分了解影响学生英语发音可理解性的共性特点、不同方言区学生的个性特点及每位学生的具体发音问题, 在语音教学中有的放矢, 优化语音教学效果。结合多媒体网络技术, 在课堂教学中集中解决共性的核心发音问题, 而个性的非核心问题则在网络化自主学习中解决。最后, 我们可考虑在口语测试中引入可理解性指标, 更多地注重学生口语交际的有效性和流利性。

5. 结语

本文系统梳理了60年来国外可理解性的研究成果, 回顾了可理解性的内涵、影响因素以及实证研究, 探讨了可理解性对我国英语语音教学的启示。概而言之, 可理解性的概念有待进一步标准化, 关于可理解性研究科学的研究设计和全面的测量方式尚需深入。未来可理解性研究应更多地置于社会文化和交际的语境中, 与语料库语言学相结合。中国拥有着世界上数

¹ RP 是 received pronunciation, 标准英音; GA 是 general American, 标准美音。

量最多的英语学习者,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不断强大和国际交流的日益增加,对中国英语口语的可理解性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英语国际语的发展呼吁英语教学范式的改变,可理解性无疑也是我国高校英语语音教学改革的突破口。本研究仅抛砖引玉,呼吁更多的学者和教师关注可理解性研究。

参考文献

- Abercrombie, D. 1965. *Studies in Phonetics and Linguistics*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derson-Hsieh, J. & K. Koehler. 1988. The effect of foreign accent and speaking rate on native speaker comprehension [J]. *Language Learning* 38 (4): 561-593.
- Bambose, A. 1998. Torn between the norms: Innovations in World Englishes [J]. *World Englishes* 17 (1):1-14.
- Bansal, R. K. 1969. The Intelligibility of Indian English: Measurements of the Intelligibility of Connected Speech, and Sentence and Word Material, Presented to Listeners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D]. Ph. D. dissertation. Hyderabad: Central Institute of English.
- Catford, J. C. 1950. Intelligibility [J]. *ELT Journal* 1 (1): 7-15.
- Crystal, D. 2008. Two thousand million? [J] *English Today* 24 (1): 3-6
- Deterding, D. 2010. ELF-based pronunciation teaching in China [J].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33 (6): 3-15.
- Deterding, D. 2012. Intelligibility in spoken ELF [J]. *Journal of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1 (1): 185-190.
- Deterding, D. & A. Kirkpatrick. 2006. Emerging South-East Englishes and intelligibility [J]. *World Englishes* 25 (3/4): 391-409.
- Field, J. 2005. Intelligibility and the listener: The role of lexical stress [J]. *TESOL Quarterly* 39 (3): 399-423.
- Flege, J. E. 1988. Factors affecting degree of perceived foreign accent in English sentences [J].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84 (1): 70-79.
- Hasman, M. 2000. The role of English in the 21st century [J]. *English Teaching Forum* 38 (1): 2-5.
- Jenkins, J. 2000. *The Phonology of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New Models, New Norms, New Goal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enkins, J. 2002. A sociolinguistically-based, empirically-researched pronunciation syllables for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J]. *Applied Linguistics* 23 (1): 83-103.
- Kachru, B. B. 1985. Standards, codification and sociolinguistic realism: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outer circle [A]. In R. Quirk & H. Widdowson (eds.). *English in the World: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36.
- Kirkpatrick, A. 2010.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in ASEAN: A Multilingual Model* [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Kirkpatrick, A., D. Deterding & J. Wong. 2008. The international intelligibility of Hong Kong English [J]. *World Englishes* 27 (3/4): 359-377.
- Levis, J. M. 2005. Changing context and shifting paradigms in pronunciation teaching [J]. *TESOL Quarterly* 39 (3): 369-377.
- Matsuura, H., R. Chiba & M. Fujieda. 1999. Intelligibility and comprehensibility of American and Irish Englishes in Japan [J]. *World Englishes* 18 (1): 49-62.
- Morley, J. 1991. The pronunciation components of 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J]. *TESOL Quarterly* 25 (3): 481-520.
- Munro, M. J. & T. M. Derwing. 1995. Foreign accent, comprehensibility, and intelligibility in the speech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J]. *Language Learning* 45 (1): 73-97.
- Munro, M. J., T. M. Derwing & S. L. Morton. 2006. The mutual intelligibility of L2 speech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8 (1): 111-131.
- Nelson, C. L. 2011. *Intelligibility in World Englishes: Theory and Application* [M].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Piske, T., I. R. A. MacKay & J. E. Flege. 2001. Factors affecting degree of foreign accent in an L2: A review [J]. *Journal of Phonetics* 29: 191-215.
- Rajadurai, J. 2007. Intelligibility studies: A consideration of empirical and ideological issues [J]. *World Englishes* 26 (1): 87-98.
- Rajagopalan, K. 2010. The soft ideological underbelly of the notion of intelligibility in discussions about World Englishes [J]. *Applied Linguistics* 31 (3): 405-470.
- Rooy, S. C.-V. 2009. Intelligibility and perceptions of English proficiency [J]. *World Englishes* 28 (1): 15-34.

- Rubin, J. 1994. A review of second language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research [J].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78 (2): 199-221.
- Smith, L. E. 1992. Spread of English and issues of intelligibility [A]. In B. B. Kachru (ed.). *The Other Tongue: English Across Cultures* (2nd ed.) [C].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75-90.
- Smith, L. E. & C. L. Nelson. 1985. International intelligibility of English directions and resources [J]. *World Englishes* 4 (3): 333-342.
- Smith, L. E. & J. Bisazza. 1982. The comprehensibility of three varieties of English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seven countries [J]. *Language Learning* 32 (2): 259-270.
- Smith, L. E. & C. L. Nelson. 2009. World Englishes and issues of intelligibility [A]. In B. B. Kachru, Y. Kachru & C. L. Nelson (eds.). *The Handbook of World Englishes* [C]. Oxford: Blackwell. 428-445.
- Smith, L. E. & K. Rafiqzad. 1979. English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question of intelligibility [J]. *TESOL Quarterly*, 13 (3): 371-380.
- Suenobu, M., K. Kanzaki & S. Yamane. 1992.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intelligibility of Japanese English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30 (2): 146-156.
- Tan. Y. Y. & C. Castelli. 2013. Intelligibility and attitudes how American English and Singapore English are perceived around the world [J]. *English Worldwide* 34 (2): 177-201.
- Tiffen, B. 1974. The Intelligibility of Nigerian English [D]. Ph. D. Thesis.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 Tsuzuki, M. & S. Nakamura. 2009. Intelligibility assessment of Japanese accents [A]. In T. Hoffmann & L. Seibers (eds.). *World Englishes: Problems-Properties-Prospets*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39-261.
- Van der Walt, C. 2000. The international comprehensibility of varieties of South African English [J]. *World Englishes* 19 (2): 139-153.
- Walker, R. 2010. *Teaching the 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文秋芳、俞希, 2003, 英语的全球化、本土化与标准化[J].《国外外语教学》(3): 6-11。

作者简介

张伶俐 (1974—),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博士后,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 应用语言学。电子邮箱: zhanglingli@cug.edu.cn

Linguistics cours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LAN Chun..... 26

School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has been dominated by an exam-oriented goal and a duck-feeding approach, which ends up in producing students who lack critical thinking. Linguistics, as a highly theoretical, abstract, critical and empirical discipline, poses a lot of challenges to students who have been brought up in this way and who are used to memorizing knowledge points and answering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linguistics course, if properly handled, can do a lot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Specifically, linguistics course can help students read critically, question critically, do research critically and write academic papers critically.

Strategy-based instruction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read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 empirical study

QIAO Ying & DENG Lei..... 32

This paper reports an empirical study of strategy-based instruction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reading. The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practic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strategy-based instruction (SBI)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reading a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Ninety-five freshmen majoring in Business English at Shenzhen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Questionnaire, test, feedback and interview show that SBI can improve students' reading speed, but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mastering of reading strategies. The majority of the students hold positive attitude about this training program.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key to SBI in English reading training a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the sele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the fostering of interest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strategies.

A new approach to turn-taking in English classroom in China

CHEN Songsong..... 39

Turn-taking in SLA classroom reflects the fluency, quantity and style of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eaching videos recorded in the 2011 Second SFLEP Cup National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Contest and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turns, their structures and strategies applied to 5 classes based on statistics. It finds that the examined teachers value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in classroom and try to maintain an interactive class. However, flaws are found in the allocation of turn-taking power, question designing and communication intention. The findings will offer some empirical support for classroom teaching as well as the contest.

A review of studies on intelligibility

ZHANG Lingli..... 47

Intelligibility is not only one of the key concepts in World Englishes (WE) and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ELF), but also the attainable goal of pronunciation teaching. However, it is an under-researched area in China. This paper, therefore, first provides a thorough literature review concerning intelligibility studies in the past six decades, whi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concept of intelligibility, its affecting factors and the empirical studi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e differences of the intelligibility studies between Smith paradigm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WE and Jenkins paradigm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ELF. It then present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intelligibility studies and the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further discusses its implications for English pronunciation instruction in China.

A pragma-discourse study of advanced ESL learner's topic introducing strategies in English argumentative writing

GONG Lili.....54

Discourse competence is a component of pragmatic competence. The ability to introduce topics in writing demonstrates the writer's discourse competence. Based on Chinese ESL learners' corpus WECCL, while taking LOCNESS corpus as the reference corpus, this paper intends to investigate the pragma-discourse features and linguistic realizations in topic introducing strategies in L2 argumentative writing by advanced Chinese ESL learners. It is found that Chinese learners do not use Topic Identification Strategy compared to native writers. By taking native writers' writing norms as reference, for the same topic introducing strategy, the learners' L2 writing demonstrates pragma-linguistic features such as: strong subjectivity, clunky and stiffly expressions, and weak reasoning. This paper aims to compare and describe differences in topic introducing strategies between Chinese learners and native speakers, tries to uncover the underlying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and provides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for teaching L2 writing.

A DST analysis of second-language vocabulary depth development

ZHENG Yongyan.....62

This paper reports a study that adopts the Dynamic Systems Theory (DST) perspective to track the second-language (L2) vocabulary depth development of eight English major students throughout an academic year. By means of a set of self-designed Vocabulary Depth Test and think-aloud protocols, the study revealed fluctuations in vocabulary depth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non-linearity in development. The learners continued to rely on the mediation of their L1-Chinese, even though L1 played differential roles in meaning sense and collocation development. Progression and regression were observed in their cross-linguistic awareness, reflecting the dynamic competition between L1 and L2 semantic information. Findings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revealed in the study reflected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the learners.